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的廉政观

李义凡 王家华 李芳楼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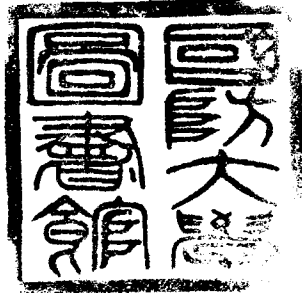
2 014 3703 4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的廉政观

李义凡 王家华 李芳楼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014 3703 4

(京)新登字185号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的廉政观

李义凡等著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32开本 7.625 印张 154 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620—1021-8/D·973

印数：5,000 定价：4.00元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彭 明

副主编

吕明军 程安辉 戴茂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地久 吕明军 李德福 陈答才

柳建辉 彭 明 程安辉 戴茂林

前 言

作为一代伟人之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界的巨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思想的各个领域大都深深地打上毛泽东的印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并举、熔东、西文化于一炉，既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又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理论丰碑。

这是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改变了我们的昨天，也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而且必将伴随着我们的明天。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其理论创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对那些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人们视线、束缚人们手脚的谬误进行剖析，作出科学的评价，正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历史的车轮不允许我们躲在毛泽东的树荫下裹足不前。

毛泽东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需要学界同仁的合力奋斗。限于学识和条件，我们只能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暂时奉呈《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制观》、《要有一个革命党——毛泽东的建党观》、《民众大联合——毛泽东的统战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的经济观》、《崇教育以培国本——毛泽东的教育观》、《生存·温饱·发展——

毛泽东的人权观》、《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廉政观》、《博大精深的兵学宝库——毛泽东的军事观》、《孜孜以求的哲学大师——毛泽东的哲学观》等几本尚显稚嫩的小册子，以示我们对毛泽东的敬意。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丛书》

编委会

内 容 提 要

腐败现象的发展已引起举国上下的忧愤。能否遏制和铲除腐败，事关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代政权由兴而衰的周期率问题时，曾非常自信地说：“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为此，他倾注了无量的心血。本书用丰富的历史和文献资料、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生动文笔，评述了毛泽东的廉政观的理论来源、思想内容、突出特点、实践成效及其不足，全方位地探讨了腐败现象在我国存在发展的原因及消除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出路。

导 论

1945年，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战后中国谁属的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面前。这年春天相继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分别为这一问题作好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但是，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都能看到，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为时不远。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三大政治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几位重要成员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等人乘机飞往延安，亲自与毛泽东接触，旨在促进国共两党恢复和平谈判。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感想时，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土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地好转了，精神也渐渐地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的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

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充满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对毛泽东的真知灼见颇为赞同。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取决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①

半个世纪过去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使自己的党和人民的政府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客观地说，这个困扰过多少代历史英才的问题，我们今天并没有彻底解决。

早在1980年，陈云就用警钟般的语言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198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党政机关中存在着腐败现象，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是提出了问题和任务，并不等于人们认识一致了。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应对腐败现象作出充分的估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掩饰和回避；有人认为，不宜把问题说得太严重，否则对改革开放不利，甚至主张只提“不正之风”而不提“腐败”。客观事实无情。1988年冬，全国近百家新闻单位的联合调查表明：党风问题（实际是消除腐败，实现廉政的问题）在国人的热门话题中仅次于物价问题而名列第二。不可否认，这两大热门话题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内在的联系，这场政治风波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朝野。党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157页。

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惩治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989年8月，江泽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而且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借口。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已经成了风的腐败现象，不管涉及多少人，都要一查到底。”^①10月，李瑞环在一个座谈会上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有加强的一面，也有削弱的一面。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但是，由于放松了党的自身建设，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纠正，人民群众是不满意的。在今年这场风波中有这么多人上街，这里除了阶级斗争问题以外，还有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②

事实证明，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从布衣百姓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从总体上说，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虽然有某些偏激或错误之处，但它是广大人民群众有爱国之心、爱党之心的表现。它说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看到一个领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的党、一个有辉煌历史和光明前途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刚刚开始即成就卓著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此而蒙垢、而停顿甚至走向毁灭。它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国家、对改革开放事业还抱着信心和希望。相反，倘若人民群众对腐败现

①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著作选读》（修订本），第679页。

② 《求是》1989年第24期。

象缄口不言、鸦雀无声，那倒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人民群众在对腐败现象的迅速发展忧虑、愤慨而有时又感到无能为力时，便普遍产生了对“毛泽东时代”那廉洁的党风、政风及社会风气的怀旧之情。这种情绪成为“毛泽东热”在全国迅速升温的“鼓风机”之一。毛泽东画像、毛泽东纪念像章及《红太阳颂歌》的录音磁带风靡神州的表象背后，固然有纷繁复杂的社会心理等等因素，但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敢于发动群众惩治腐败分子的行为的怀念和崇敬，的确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忧愤终归忧愤，怀旧终归怀旧。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探寻廉政建设的出路。

出路在哪里？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得失何在？我国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些问题都是全党全国人民不能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课题。研究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本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我们决不敢说这本拙著就能解决问题，只愿它能抛砖引玉，为解决问题尽绵薄之力。

要研究毛泽东的廉政观，不能不首先弄清他及他的战友们对“官僚主义”、“腐败”、“廉洁”的理解和认识。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官僚主义”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相对而言，毛泽东却很少使用“腐败”一词。纵观毛泽东的廉政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发现：毛泽东所言的“官僚主义”，其内含十分丰富，“腐败”的主要内容就包括在其中；他一生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政府内的存在发展保持着高度警惕，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官僚主义的抨击日益激烈，直至把官僚主义者斥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吸人民血膏的资产阶级分子。

什么是“官僚主义”？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所作的阐释不尽相同。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象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却相反。”①

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把贪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衙门作风、公文旅行等现象列为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官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②必须坚决克服那种喜欢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不切实际的空论，不注意不善于团结广大群众和积极分子，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而不深入实际去做个别的具体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③因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现象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他的忧虑明显加深，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⑤因此，他

①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以下只注第2版），第1卷，第124—125页；第3卷，第896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0页，902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7

抨击官僚主义的言辞也明显激烈起来。但是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毛泽东似乎并没有专门给“官僚主义”下过明确的定义。

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①随后他又更深刻地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戒。”^②“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③“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④“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③④ 均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①

这样成段抄录毛泽东的原语，虽有冗长之嫌，但是这些原语极为鲜明地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的廉政观，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问题：（1）毛泽东所批评的“官僚主义”主要包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贪污浪费，玩忽职守，横行霸道，压制民主，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等。（2）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者的愤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3）毛泽东孜孜以求的，确实是避免党政官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他把人民群众用示威游行等方式反对官僚主义，视为一件好事，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伟大领袖的胸襟和独特的思维方法。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解释，把官僚主义分解为二十种：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1月15日）。

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迳；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拦，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杂，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报表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骗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

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①

从周恩来的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思路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所说的“官僚主义”也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一般的工作错误（主要是前十条），又包括贪污受贿、执法犯法、任人唯亲、官官相护、奢侈浪费、欺压百姓等等腐败行为（主要是后十条）。

非常有趣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对官僚主义表现所作的归纳与周恩来不谋而合。

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专题分析了“官僚主义倾向”问题。他认为“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等。”^②建国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各级政权的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有些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压、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

① 《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6—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6页。